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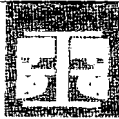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马雪芹 / 著

Hangzhou Zheng Qu Shi

杭州政区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杭州政区史

马雪芹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杭州政区史/马雪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004-9523-9

I. ①杭… II. ①马… III. ①政区沿革—杭州市 IV. ①K9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868 号

责任编辑 吴连生
责任校对 刘晓红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42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辛 薇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其煌 史及伟 李志庭 何忠礼

陈 铭 林正秋 周 膺 唐龙尧

徐吉军 顾志兴 顾希佳 薛家柱

本书以今日大杭州的地域范围为对象，探讨从先秦至 2009 年年底杭州地区的政区变迁。

杭州古为扬州之域，距今 8000 多年前境内已有人类活动；距今 4000 多年前已有精美的玉器制造和发达的农业，并显露出文明的曙光；春秋时期又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霸大剧。杭州之地本属越国，吴、越争战期间，曾一度成为吴国的附属，后又归属越国。公元前 333 年，楚灭越，杭州所在地又归属楚国，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杭州所在之地归秦。

杭州有正式政区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实行郡县制，今杭州地区属于会稽郡和鄞郡的部分地区，会稽郡下有钱唐、富春、余杭 3 县。西汉杭州为会稽郡和丹阳郡地，会稽郡下辖钱唐、富春、余杭、余暨 4 县，丹阳郡下辖於潜县，会稽郡西部都尉治钱唐。东汉杭州县数增加，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今杭州境内）有 4 郡、7 县、1 侯国的政区设置，其中吴郡下辖余杭、临水、富春 3 县和钱唐侯国，会稽郡下辖余暨县，丹阳郡下辖於潜县，新都郡下辖始新、新定 2 县。

六朝时期，今杭州地区的政区设置有了较大的突破，先是三国孙吴政权时期分乌程等 9 县设立吴兴郡，今杭州地区余杭、临水、於潜 3 县属之。新置桐庐、新昌、建德、新城 4 县，均属吴郡。吴郡属县由东汉的 3 县 1 侯国减去余杭、临水 2 县外又增至 5 县 1 侯国。吴改余暨县为永兴县，仍属会稽郡。新都郡辖始新、新定 2 县不变。

东晋除改钱唐侯国为钱唐县、改新定县为遂安县外，其他均沿袭孙吴，无所变更。

宋、齐、梁三朝除梁以建德属金华郡外，其他无所变更。

陈以钱唐设钱唐郡，下辖钱唐、富阳、於潜、新城 4 县，其他吴郡、

吴兴、新安、会稽、金华 5 郡共辖 8 县，今杭州地区共有 6 郡 12 县的政区设置。

从六朝开始，整个江南地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杭州的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钱唐、富春先后作为郡的治所，为隋代杭州的设立创造了条件。

隋唐五代时期是杭州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杭州政区发展史上重要阶段，尤其是五代吴越国时期，以杭州作为国都，奠定了杭州“东南第一州”的历史地位。首先是隋代设立杭州，使杭州之名最早见于史籍，其后杭州辖县不断增加，由最初的 5 个增加到 7 个。同时在今杭州境内又设立了睦州，下辖雉山、桐庐、遂安 3 县，加上当时属于越州的永兴县，今杭州地区就有了 3 州 11 县的政区建制。唐代杭州政区在隋代基础上又有发展：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今杭州境内）县的设置达到 16 个，唐后期减少到 15 个。但这个减少是区域内政区合并的结果，其区域范围和人口并未受任何影响。五代时期，杭州作为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各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尤其是在当时各个政权之间相互争斗、战乱频仍的情况下，吴越国坚持奉行“保境安民”国策，使杭州一直没有遭受战乱的洗劫，各方面得以持续发展，奠定了北宋杭州继续繁荣、南宋成为国都的基础。吴越国杭州区域比唐代扩大，将湖州之武康县仍划归杭州，辖县增至 11 个，其余睦州和越州情况和辖县不变。这样，吴越国时期杭州辖县达到 17 个，是今杭州境内辖县最多的时期。

北宋武康县仍划归湖州，但曾一度置南新县，所辖区域比吴越国小，但辖县数相同。南宋杭州辖县比北宋少南新县，但整体政区地位提高，国都所在县钱塘、仁和升为京县，杭州所辖县升为畿县。除杭州成为国际性大都会、世界一流城市外，杭州地区各县经济繁荣，人口增加，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元、明、清三代杭州失去国都地位，但仍不失为两浙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杭州的政区格局和宋代一样，基本保持了 3 州 16 县（其中海宁一度为州）的政区设置，是杭州地区政区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

民国改元伊始，即废钱塘、仁和 2 县，以其地设立杭县，杭州地区辖县减少到 15 个。又海宁县属钱塘道，归入嘉兴地区；杭州辖县变为 14 个。1927 年以杭县部分区域设立杭州市，奠定了以后杭州地区政区的整体格局。其后杭州政区屡有变迁，但杭州市和区域内各县设置基本不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杭州地区政区变化较大，1958—1960 年进行了撤县、并县活动，杭州地区原有的 14 县合并成为余杭、萧山、富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 7 县，奠定了杭州地区 1 市 7 县的政区格局。此后虽然在基层政区中有政社合一、政社分设、撤区、扩镇、并乡等等的调整，各基层政区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杭州地区大的政区格局始终没有改变，直到目前杭州市的 8 区、3 市、2 县的政区格局，也是由原

来的1市7县演变而来。

纵观杭州地区政区的演变，有一个从简到繁、从少到多，又从繁到简、从多到少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政区整合密切相关，所以在论及杭州政区变迁时，对不同时期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进行论述，以见其和政区发展的密切关系。由于时代越久远，政区设置数量就越少，政区内涵相对简要，资料也相对缺乏，所以在全书章节的安排上，越是早期政区的论述，时间的跨度就越长，而越到后期，时间跨度就越短。如从秦设立郡县到隋统一南方，长达800余年的时间，仅用一章就全部概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60年间，杭州政区调整频繁，资料众多，不得不以两章的篇幅加以论述，就这样每章的内容还比其他各章要多。

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杭州地区所设各县也都有自己发展的轨迹，同样值得人们去关注和了解，即使那些已不存在的县，但曾经的发展也不容忽视。所以在整体论述了杭州地区政区发展变迁的情况后，对区内原有各县的历史沿革以专章进行叙述，以便于了解杭属各县的演变脉络。

杭州地区政区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杭州之所以从一个山中小县发展成为两浙地区的地域中心政区，也有许多重要的因素使然。所以在回顾了杭州地区政区发展过程之后，设立专门章节对杭州区域政区中心形成的原因与存在问题进行论述，阐发一己之见，以期为今后杭州政区的改革发展提供借鉴，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书中插图60幅，分别展现杭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区变迁，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图片均是利用原有图片或前人的研究成果；关于杭州地区各个时期的政区情况，则是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参照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因为没有确切的比例，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全是手工操作而成，所以这些插图都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政区地图，只能作为各个不同时期的政区示意图。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先秦至六朝时期的杭州政区	1
第一节 杭州史前文明	1
第二节 先秦、秦汉时期的杭州政区	7
第三节 六朝时期的杭州政区	22
第二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杭州政区	39
第一节 隋代杭州政区	39
第二节 唐前期杭州政区	46
第三节 唐后期杭州政区	52
第四节 五代时期的杭州政区	62
第三章 两宋时期的杭州政区	75
第一节 北宋杭州的发展及政区	75
第二节 南宋杭州的发展	84
第三节 南宋杭州的政区	92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杭州政区	109
第一节 元代杭州政区	110
第二节 明代杭州政区	120
第三节 清代杭州政区	129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杭州政区	145
第一节 民国时期杭州的发展变迁	146
第二节 民国前期的杭州政区	151
第三节 民国后期的杭州政区	156
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杭州政区(1949—1976)	169
第一节 1949—1957 年的杭州政区	169
第二节 1958—1965 年的杭州政区	180
第三节 1966—1976 年的杭州政区	195
第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杭州政区(1977—2009)	201
第一节 1977—1984 年的杭州政区	201
第二节 1985—1992 年的杭州政区	205
第三节 1993—2007 年的杭州政区	216
第四节 2008—2009 年的杭州政区	228
第八章 杭州所属市、县历史沿革	249
第一节 杭州市历史沿革	249
第二节 建德市、富阳市、临安市历史沿革	255
第三节 桐庐县、淳安县及其他各县历史沿革	260
第九章 杭州区域政区中心形成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271
第一节 地理环境对区域政区中心形成的影响	271
第二节 政治因素对区域政区中心形成的影响	274
第三节 经济状况对区域政区中心形成的影响	276
第四节 杭州地区政区发展变迁中存在的问题	278
参考文献	283
后 记	289

第一章 先秦至六朝时期的杭州政区

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今天的杭州地区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杭州地区属于当时的越国。吴、越夫椒之战后，越败于吴，杭州曾一度属吴。后越灭吴，杭州地区又回归越国。战国后期，楚灭越，杭州地区属楚。这段时期，浙江地区的政治中心在今天的绍兴，杭州地区还没有明确的政区设置，因而要研究杭州政区设置，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只能从秦统一六国，设立钱唐县开始。

秦汉时期，今杭州地区的政区设置都相对简单；六朝时期是南方政区建制史上一个比较混乱的阶段，杭州的情况也是一样。政权的更迭，政区的分割，使其规模越来越小；侨州郡县的设立和土断政策的实行，使南方的政区设置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但由于杭州处于南方各个政权的后方地区，和边缘的江淮地区及江汉地区相比，政局相对稳定，因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比较迅速，使杭州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到南北统一时，杭州已从一个普通的山中小县发展成为郡的治所所在地。

第一节 杭州史前文明

杭州地区的史前文明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都有遗存，1974年冬天，考古专家在建德市李家乡新桥村南面的乌龟洞发掘出一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及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经科学鉴定后认为，这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距今大约有5万年左右的历史，这一时期相当于更新世晚期的最后阶段，和1958年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发现的“柳江人”属同一类型，都是晚期智人。于是，建德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就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命名为“建德人”。

“建德人”的发现是今杭州地区乃至整个浙江省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遗迹，它的发现，增加了晚期智人化石在中国境内的分布点，拉开了杭州地区乃至浙江史前文明的帷幕，具有重大的考古学意义。同时，建德人的发现，也为研究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变，以及远古时期哺乳类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000年5月，在杭州境内的桐庐县印渚镇延村又发现了一枚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和近百件水牛、黑熊、猪、赤鹿、中国犀等动物化石，经研究确认，这枚古人类头盖骨化石的形成时间大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者更早一段时期，距今约1万年前到2万年前的时间。这次在桐庐县的考古发现，是杭州地区乃至浙江境内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古人类考古发现，它填补了浙江人类历史从距今5万年前的“建德人”到距今8000多年前的跨湖桥文化之间长达数万年的历史空白，对研究杭州地区、浙江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人类发展演变的过程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建德和桐庐地区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说明早在距今5万年到距今1万年前左右的旧石器时代，今杭州地域内就有古人类的活动踪迹。其后到公元前8000年—前4000年，跨湖桥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今杭州地区的史前文明进一步明晰和具体化。

跨湖桥遗址位于今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跨湖桥西南，遗址初次发现于1970年，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没有对其进行及时发掘。20年之后的1990年，跨湖桥遗址再次被发现，并于当年10—12月对之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石斧、石镞、骨锥、木簇、黑陶、彩陶和陶纺轮等文物器具，并发现建筑遗址六组以及大量的房屋木结构件。后经专家认证和C14测定，认为跨湖桥遗址距今约有8000—7000年前之久。2001年，浙江省考古部门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又发现了一大批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等器物，其中有带圈足的木盘、桨形器、苇编的畚箕残片、精巧绝伦的骨针、不同于河姆渡捆装法而使用插装法的骨耜、神秘的骨哨，以及稻谷、动物残骸、石器、木器、陶器等大量文物。2002年9—12月，浙江省考古部门对跨湖桥遗址的遗留部分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有了比前两次更加惊人的发现，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独木舟的出现。

跨湖桥独木舟的遗留形式为东南—西北方向，船头朝东南，船尾向西北，非常狭长，接近船尾有一小部分因为砖瓦厂取土而被截掉。残留的船身现长5.6米，船身最宽处为53厘米，船体深20厘米，船体的材质为松木，船帮有部分损坏，因而宽窄不一。在船体凹面内，有多条支撑横木的痕迹。在独木舟的两侧还发现有木桩、木板、木料、船桨、砺石、石镞、编织物等文物和一些炭灰的遗迹，很有可能是和独木舟制作有关的加工现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认为，当时造船的加工工具应该是石镞，其船身纵向加工过的痕迹非常明显。判断独木舟所在的年代，考古专家的依据是古船所在地层的年代：这里是第九文化层，相应推断出独木舟的

“年龄”约为7500—8000岁，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对于研究人类早期水上交通具有重要意义（见图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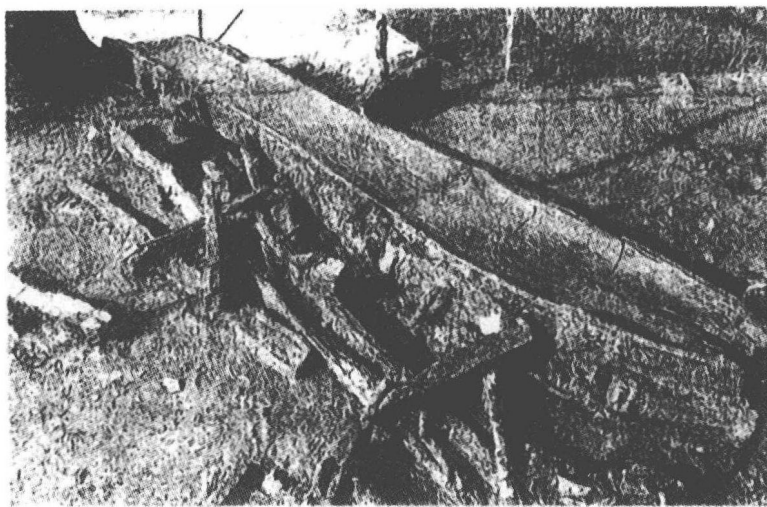


图1—1 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独木舟

资料来源：马时雍《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除独木舟外，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野兽残骸和兽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对之研究后认为，“这个遗址已经存在家猪，这是中国饲养家猪的起源时间肯定早于距今8000年以前的极为珍贵的线索”^[2]。

跨湖桥文化遗址中还出土有稻谷和骨耜，“这不但将长江下游种植水稻的历史（在河姆渡文化的基础上）提前了千年，而且证明江南先祖当时已经摆脱了‘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进入耜耕农业时期”^[3]。

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比著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早1000年左右，这充分说明，早在距今8000多年以前，在今日的杭州地区就有人类文明的存在。虽然由于地理因素和海平面上升的原因，跨湖桥文明在存在了一段时间后又悄然消失，但曾经的光辉灿烂给后代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

良渚文化遗址位于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距今约5300—4000年前。于1936年12月和1937年3月开始初次发掘，发现颇丰，后因遭遇战争，时局动荡而停止。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良渚文化遗址又进行了多次发掘，得到了众多的文化遗址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今天杭州市余杭区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良渚文化遗址群。

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其遗存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

一是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其中以玉琮、玉钺为代表（见图1—2、

^[1] 参见蒋乐平、朱倩、郑建明、施加农《跨湖桥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独木舟》，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21日。

^[2] 张大伟、施芳：《跨湖桥遗址让家猪饲养史上溯至8000年前》，载2005年8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3] 诸巍、于靓：《文明比河姆渡又早一千年》，载《中国地名》2004年第2期。

图1—3)，此外还有大量的玉璧和玉制的龙首纹器、神兽纹玉牌、玉珠、玉管、玉坠等，并且发现有制玉的作坊，充分反映了当时玉器制作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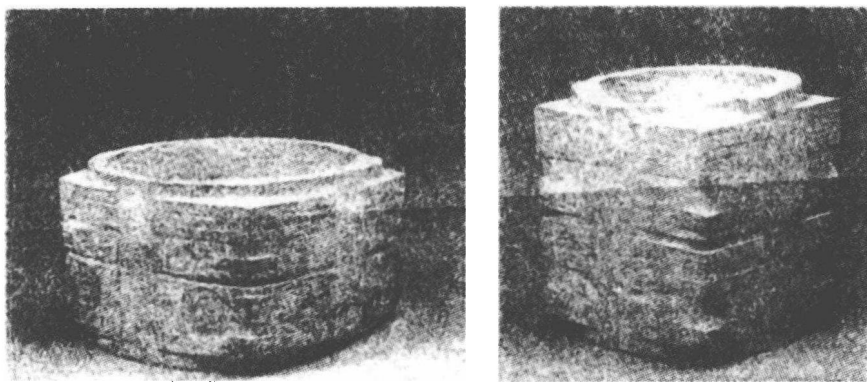


图1—2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

资料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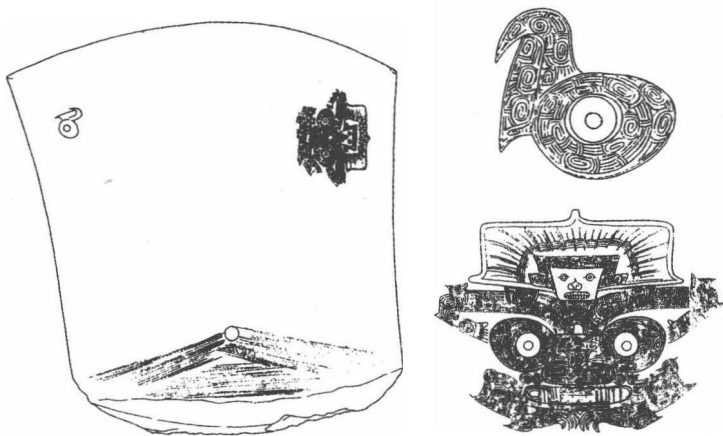


图1—3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钺

资料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二是石犁的发现，良渚遗址发现的石犁，通长106厘米，头部由3件组成，总宽44厘米，犁头的尖端部分为等腰三角形，有两个穿孔，并且有用过的痕迹。经过反复分析和考证，专家们认为，目前所见石犁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石犁（见图1—4）^[1]。良渚文化遗址中石犁的出现，说明距今4000多年以前杭州地区的农业已经比距今8000多年前杭州跨湖桥、距今7000多年前的余姚河姆渡等文化遗址的农业发展高出了一个层次，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距今4000多年前杭州地区农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由于有了充足的粮食，所以制

^[1] 参见中华科技网2005年2月28日文章《神秘史前石犁惊现浙江，首次发现人狗合葬墓》。

陶、制玉、纺织等手工业者就可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力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使手工业制造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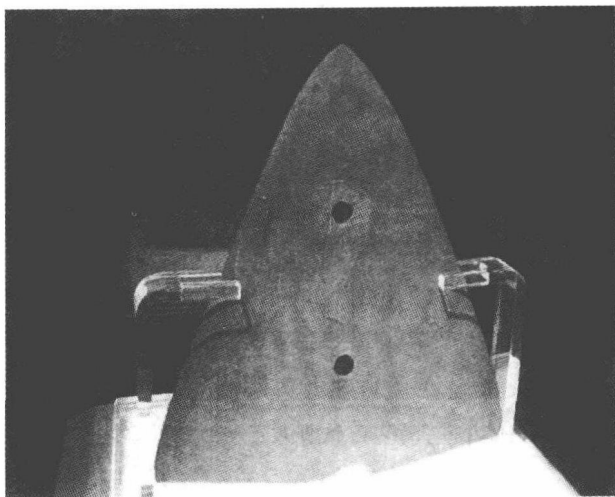


图 1—4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

资料来源：《余杭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余杭镇志》卷首附图，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三是墓葬群的大量发现，从墓葬群的大小、形制，陪葬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的区分中可以充分看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差别，为人们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线索。

良渚文化遗址墓葬群的发掘已经清楚地表明，距今 4000 多年前的杭州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已经分化成为不同的等级阶层，在发掘出的贵族墓地中，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和制作精美的玉礼器。其中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 20 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与其相对的则是同属良渚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地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装饰所用的玉器，如玉管、玉珠之类。

墓葬的形制与陪葬品质量、数量的区别已经表明了墓主人身份贫富的巨大差别，而修筑在高台建筑上的墓葬更进一步说明墓主人不仅富有，而且具有凌驾于氏族之上的特权，“高台建筑所反映的并与之相应的不可能是氏族社会不患贫唯患不均的氏族公社制经济，至少是贫富差距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文明已经在这里孕育，曙光已经可现”^[1]。

不光是贫富差距、等级贵贱在良渚文化中得到了表现，而且有学者通过对良渚文化中随葬品的研究后认为：“在良渚文化中晚期，应已形成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和习俗、共同的经济基础。……良渚文化晚期可能已进入部落王国时代，是‘原始的国家，’或

^[1] 丁金龙、何凤英：《良渚文化土筑高台遗址分析》，《东南文化》1997 年第 3 期。

[1] 车广锦：《良渚文化玉琮纹饰探析》，《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形成中的国家’。”[1]

贫富差别、等级制度、古城古国等等的出现，说明良渚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达到史前文明的巅峰。

和跨湖桥文化一样，也是由于自然（当然也不排除战争的因素）的关系，良渚文化也是在存在了1000年左右之后，即从人们的眼里神秘消失，给后人留下了无尽想象的空间。

2007年，关于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又有了令人震撼的新发现，使人们对良渚文化消失的说法产生了质疑，这就是良渚文化遗址区内良渚古城的发现。

新发现的良渚古城以良渚文化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米—1700米，南北长约1800米—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方向正南正北。新挖掘出的城墙遗址有5处，从挖掘现场看，城墙的宽度约达40米—60米，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明初所建造的西安城墙的3—4倍（西安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底部的墙基用石块垫成，上面用黄土堆砌、夯实。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片和瓷片分析，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的晚期，距今至少有4000多年的时间。从城墙遗址探测计算出的古城面积为290万平方米左右，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大的古城（见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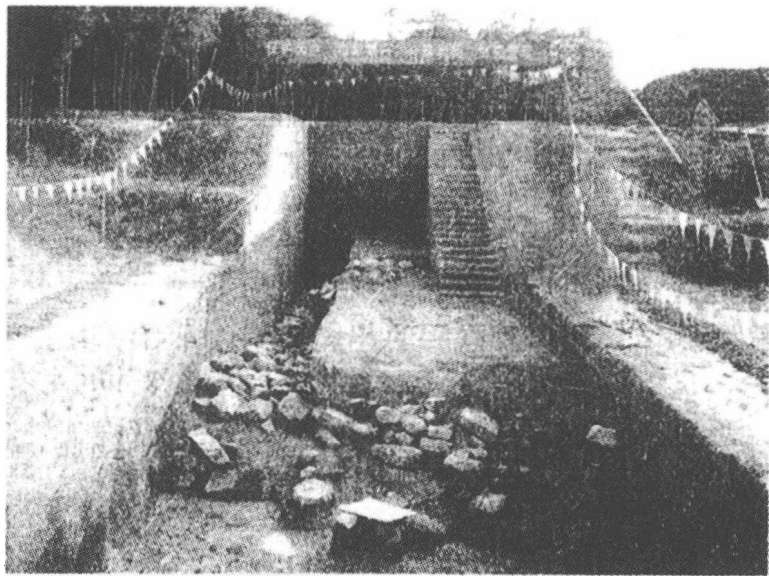


图1—5 新发现的良渚古城城墙遗址

资料来源：李强拍摄。

城墙的修筑和城市的出现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重要标志，良渚古城的发现说明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国家，有了文明生活的形态。而前述良渚文化中石犁的发现，也说明良渚时期的生产已由耜耕农业进入到犁耕农业阶段，是农业发展的一个跨越性的进步。两者结合起来，就改变

了过去良渚文化只是史前文明曙光的说法，说明良渚文化晚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良渚古城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埋葬于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墓葬中的贵族们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他们生前居住于建造坚固、规模宏大的古城之中，死后就埋葬在附近的山地。他们是良渚古国的统治者，也是杭州史前文明的缔造者。

良渚古城的发现，也可以使我们对良渚文化的去向设计一个新的方向：即良渚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并继承下来了，并对以后的夏、商、周时期的古越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上以“建德人”和“桐庐人”为代表的旧石器时期、以跨湖桥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早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等3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是今杭州地区史前文明的不同发展时期。虽然这些不同时期的文明已经或者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地消失，但杭州地区曾经有过的文明和辉煌，使人们不得不对这块土地萌生出深深的敬意，同时也萌生出对其政治历史的进一步追寻。

第二节 先秦、秦汉时期的杭州政区

先秦时期的杭州政区

先秦时期中国的政区建制，由于资料的缺乏，至今仍是一个无法搞清楚的问题，最早说到和政区稍有关联的是记载先秦时代史实的《尚书》，其中的《舜典》和《禹贡》两篇都说到分州的事，其中《舜典》云：“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汉孔氏传曰：“禹治水之后（分天下为九州），舜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始置十二州。”^[1]同一书的《禹贡》篇又把全国分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正好回应了《舜典》的说法。《吕氏春秋》又对九州的地望做了比较具体的划分，其云：“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2]《汉书·地理志》又云：“昔在皇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合万国’，此之谓也。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3]这里又是说尧时即分天下为十二州，大禹治水之后才合并为九州。又因《左传·襄公四年》曾引周初《虞人之箴》中“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之语，这就更加坚定了早在大禹时期，中国在政区划

^[1] 《尚书注疏》卷2《虞书·舜典》。

^[2] 《吕氏春秋》卷13《有始览第一》。

^[3] 《汉书》卷28《地理志》上。

分上已经了有九州的说法。故至今言及中国早期政区，仍然不由自主地会想到“九州”二字。

先秦时期杭州所在的地域属于扬州，关于扬州，《尚书·禹贡》的记载是：“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1]大意就是三代时期的扬州在淮河到江海之间，境内有彭泽湖，是候鸟栖息的地方。还有三江和震泽（太湖），草木茂盛，有很多高大的竹子和树木。土壤是涂泥，土地的等级是下下，田赋是下下和下上错交，贡物是金、银、铜三种。物产有美玉、象牙、犀牛皮、美丽的羽毛、贝类，还有橘子、柚子等，人们穿着用葛、鸟羽、草等编织成的衣服。进贡的路线从江海到淮泗，送至贡主所居之地。

到了周代，将《禹贡》的徐州合并于青州，梁州合并于雍州，又将《禹贡》的冀州分为冀、幽、并三州，仍保持了九州之说，只是九州的名称和《禹贡》已经有了不同。

周代杭州所在的地区仍然属于扬州，周代的扬州，和夏代时的情况又有一些不同，“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2]。大意是说东南地区被称为扬州，境内最大的山叫会稽山，最大的泽叫具区，江有三江，湖有五湖，物产有金、锡、竹、箭，百姓的男女比例是二比五，人民可以畜养鸟兽，主要的农作物是稻谷。

以上关于先秦时期对于扬州的描述，都和其时杭州地区的实际情况有许多共同之处。遗憾的是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使人们无法对其时杭州的情况做比较细致的了解和描述。

杭州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从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开始。吴国的创始者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弟弟仲雍，其都城最初在太湖附近的梅里（今江苏省无锡一带，一说是今江苏镇江、丹阳一带的朱方），吴越争霸时吴国的都城已经迁到吴（今江苏省苏州市）。越国的创始者据说是大禹的后裔无余，到越王勾践时建都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本来吴、越两国的分界在今天的浙江嘉兴一带，其北属于吴国，其南属于越国，今杭州所在的地域属于越国所有。公元前494年越国出兵伐吴，被吴军大败于夫椒山（今江苏太湖中之包山），后又被吴军围困于今绍兴东南的会稽山上，越国被吴国占领。后来双方达成协议，越王勾践到吴国服役三年，越国成为吴国的附属国，杭州所在之地遂属于吴国。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被放归越国，并得到一定数量的封地：“南至于勾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3]从地理方位来说，勾无即今诸暨，御儿即今嘉兴，鄞即今宁波，姑蔑一般认为是今天的浙江龙游县^[4]，这样今杭州所在地又归属于越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两浙及江苏地全部归越。公元前333

^[1] 《尚书注疏》卷5《尚书·禹贡》。

^[2] 《周礼注疏》卷33“职方氏”条。

^[3] 《国语》卷20《越语》上。

^[4] 按《国语》韦昭注，“姑蔑，今太湖是也”，从地理位置看，太湖在御儿之南，不当为西。晋杜预左传注云：“姑蔑，越地，今东阳大（太）末县”（《春秋·左传注疏》卷59，哀公十三年）。太末县为汉县，在今浙江龙游县。故臧励榘等所编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版）注姑蔑云“今东阳太末县，其地在今浙江龙游县北”。